

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背景

——兼及明初江右诗歌创作的“雅正”风尚

温世亮, 金建锋

(南昌师范学院 中文系, 江西 南昌 330032)

【摘要】明初江右诗坛, 诗歌繁荣, 诗人众多, 但在地理的分布上, 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并显示出鲜明的区域特征。明初江右诗人地理分布所表现出的格局态势, 与地理经济、人文积淀、教育情形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诗人们大致相同的生活时空, 又使明初江右诗歌创作呈现出地域趋同性, 雅正即为其中之义。

【关键词】明初; 江右诗人; 地理分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33-05

承宋元之余绪, 明代江右依然是文化极其活跃的区域之一, 其地之诗歌即表现出彬彬之盛, 明代初期则尤称典型, 以刘崧为首领的“西江诗派”, 以杨士奇为中心的江西“台阁体”诗歌, 等等,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 不仅显赫一时, 而且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而明初江右诗歌兴盛发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 即是诗人数量众多, 并流传下大量的诗歌作品。唯其如此, 作为当时一种突出的文学文化现象, 就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诗歌的总体创作倾向做出讨论, 对于明代江西乃至明代全国文学生态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基础价值。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笔者不揣浅陋, 拟以《江西诗征》等相关文献典籍为基础, 对以上两个问题予以初步的梳理、探讨和论析。

一、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格局

明代初期的江右籍诗人, 在许多古代史书方志的《艺文志》、现当代编撰的文学家大辞典, 以及一些文学史著述中均有叙录, 但这些成果多带有重视主流作家而轻忽非主流作家的倾向, 所以, 总显得不够完备, 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其实际面貌。因此, 我们选择地域特色鲜明的《江西诗征》(以下简称《诗征》)作为中心, 来考察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格局。

选择《诗征》作为中心来进行讨论, 主要在于《诗征》不但展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而且具备了“全”的

特点, 具体表现有三个: 一是就所选诗人范围而言, 一如卷首编选者曾燠“自序”所言坚持“以诗存人, 亦以人存诗”的原则, 《诗征》所选具有较为宽泛的特点, 所录诗人既有声明不振的韦布之士, 又有以清淡闲适为尚的隐逸之流, 也不乏像危素、刘崧、杨士奇这样官高权重的卿相大员, 所涉阶层较为全面, 这无疑赋予《诗征》对明初江右诗坛做出全局观照的先决条件。二是《诗征》“以编年为体, 序次先后均按列代年纪, 不以郡县分编”(卷首“例言”)为准则, 时代分期至为明晰。三是《诗征》所选诗人除少数外, 籍贯和身份均有明确标示, 这恰恰为我们就明初江右诗人地理分布特点做出准确周全的归纳提供了便利。总之, 《诗征》所取范围, 固然还无法将江西诗人网罗殆尽, 与实际情形难免存在差距, 但其出于“桑梓敬恭”而“二十年来搜辑比缀”(“自序”)的编选态度, 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当时江右诗人揽于一体, 较为客观地展示了江西诗歌的实际水平和面貌, 因此, 将之作为考察明初江西诗人的地理分布问题便有了充分的可行性。

明代基本上沿用元代体制, 在江西省设立南瑞、九江、湖东、湖西、岭北等5道, 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等13府。《诗征》录明洪武至正统间江西诗人凡243人(其中郭矮梅、袁敬所两人籍贯不明确), 为便于分析, 今按籍贯将诗人的地理分布列表(见表1)。

【收稿日期】2015-01-26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明初江右诗歌研究”(14WX09)、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NSBSJJ2013013)、南昌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NSXK20141004)

表1 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按籍贯)

道	府	各州县诗人数	人数
南瑞	南昌	南昌(12) 丰城(11) 奉新(7) 宁州(4) 进贤(3) 靖安(1) 新建(1) 武宁(0)	39
	瑞州	高安(0) 上高(0) 新昌(1)	1
九江	饶州	鄱阳(11) 德兴(3) 余干(3) 乐平(3) 浮梁(1) 安仁(2) 万年(0)	23
	南康	星子(2) 都昌(0) 建昌(0) 安义(0)	2
	九江	德化(1) 湖口(3) 瑞昌(1) 彭泽(0) 德安(0)	5
湖东	广信	贵溪(5) 铅山(2) 弋阳(1) 上饶(0) 玉山(0)、永丰(0) 兴安(0)	8
	抚州	临川(15) 金溪(5) 宜黄(3) 乐安(2) 崇仁(2) 东乡(0)	27
	建昌	南城(9) 南丰(6) 广昌(6) 新城(5) 泸溪(0)	26
湖西	吉安	泰和(23) 庐陵(15) 吉水(12) 安福(7) 永丰(5) 永新(2) 龙泉(1) 万安(0) 永宁(0)	64
	袁州	万载(3) 分宜(2) 宜春(0) 萍乡(0)	5
	临江	新喻(14) 新淦(12) 峡江(5) 清江(4)	35
岭北	赣州	赣县(2) 信丰(3) 宁都(1) 龙南(1) 兴国(0) 雩都(0) 会昌(0) 安远(0) 瑞金(0) 石城(0) 定南(0) 长宁(0)	6
	南安	南康(0) 上犹(0) 崇义(0) 大庾(0)	0

由上表不难看出,明初的江西诗坛,诗人数量众多。值得注意的是,《诗征》所录诗人声名响彻宇内的亦不为少数,如“西江诗派”盟主刘崧,“台阁体”主帅杨士奇,以“无人臣礼”下狱的才子解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大部分尚有诗文别集刊行,这说明明初江右诗歌在江西宋元诗歌文化的观照下,依然发达繁荣。不过,这243位诗人的地理分布格局,又表现出较为清晰的区域特征。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代初期,环鄱阳湖地区乃江西诗人集中的区域。所谓的环鄱阳湖地区,即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大致指明代江西的南瑞道、九江道、湖东道、湖西道等行政区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包括南昌、抚州、新余、鹰潭、上饶部分,宜春东部在内的赣中、赣东、赣东北地区,以及吉泰盆地(以庐陵、泰和、吉水为中心的吉安地区)。这几个行政区域的诗人约计235人,占《诗征》所录明初江右诗人的95%以上,相对于岭北区域(赣州和南安府)总数仅6人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一分布态势,也基本上延续了宋元时代的江西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格局^①,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历史文化基脉的地域性传承。

(二)从单一的府治分布来看,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其中,吉安、南昌、临江、抚州、建昌等府乃当时江西诗人集中的核心区域,而饶州、广信等府则为江西诗人聚集的次中心。这一时期,两个中心的著名诗人数量也非常多,以《诗征》所选为例,其

中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便不下30人,如吉安府的刘崧、王沂、王佑、解缙、杨士奇、胡广、邹缉、萧翀、曾棨、熊概、李时勉、梁潜、李昌祺、周忱、周述、罗汝敬、余学夔,南昌府的朱善、胡俨、曾一本、李仲训、刘秩,抚州府的危素、吴伯宗、揭轨、王英、吴溥、熊鼎、黎公升,临江府的金幼孜、梁寅、黎充辉,等等,他们在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田《明诗纪事》、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等重要的全国性诗歌选本中均有选录。由此可见,这些江右诗人在明代诗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否则是难以进入钱谦益、朱彝尊等眼光极为挑剔的操选者法眼的。

(三)就同一府治州县而言,诗人分布的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以吉安府为例,吉安府在明朝辖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等9县,如果论诗人之数量,泰和、庐陵、吉水最多,安福、永丰次之,万安、龙泉、永新、永宁等则偏少。相比较而言,抚州府的情形也不例外。抚州时辖临川、金溪、崇仁、宜黄、乐安、东乡等6县,从诗人的聚集分布而言,临川、金溪、宜黄等县较为集中,其他则偏弱。再来看南昌府的情况,南昌时辖宁州、南昌、新建、丰城、进贤、靖安、奉新、武宁等州县,诗人则主要分布在南

^① 关于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可参夏汉宁《试论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昌、丰城、奉新、宁州等州县。不过，建昌府所治5县，除泸溪外，诗人的分布则相对平衡。

(四) 集群性特点较为明显。明初江右诗人就总体而言，呈不平衡状态分布，但并不松散，彼此联系紧密，产生了一批地域性、家族性、师缘性的诗人群落。除我们熟知的以刘崧为首的“西江诗派”之外，据《诗征》记载，在明初尚有以鄱阳周湏以及李宗颐、刘源善、辛敬、万石、杨伯谦等为代表的“江西十才子”^{[1](卷四十三)}，以梁寅、周所立、张美和等为代表的“临江十才子”^{[1](卷四十三)}，以南昌李仲训为代表的“江南十才子”^{[1](卷四十六)}，而临川甘瑾则与金溪危素、黄君瑞、张仲举等友好，以诗文相“颉颃”^{[1](卷四十一)}。同样，文学家族的优势也很明显，在《诗征》所录诗人中，实不乏薪火相传的家族性诗人，如南昌熊直、熊概父子，庐陵罗以明、罗汝敬父子，吉水胡子祺、胡广父子，永新刘颢、刘定之父子，吉水周述、周孟简兄弟，清江黎慎、黎恬兄弟，林林总总，难以悉数。另外，像“江右诗派”“临江十才子”等，其中成员则又多以师友相称。

二、明初江右诗人地理分布的文化背景

从前文分析可知，明初江右诗人的地理分布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呢？我们知道，地域文化的发展与诸如地理经济、人文积淀、教育情形等区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探讨明初江右诗人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格局，同样可以从这些角度逐一展开讨论。

(一) 地理经济背景。从地理位置言，南昌、吉安、临江、抚州、建昌、鄱阳等府县，得天独厚，是唐宋以来交通、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些府县处鄱阳湖的西南、东北或东南岸，赣江、抚河、信江、泸溪等大江大河等贯穿其间，区域之内河道密布，水域广袤，人口众多，不但物产丰富，而且交通极其便利，东可通于闽越，南可达于粤，北则溯赣江、通长江，直抵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如吉安府，据万历《吉安府志》卷二《地輿志》载：“疆域之广，咽喉荆广，唇齿淮浙，相地度势，设险隘以为捍御，觐形胜者曰：‘吉安于江西为剧郡，庐陵为吉安为剧县。’”吉安属古扬州地，秦汉时便设郡立县，不仅地理条件优越，农业经济也非常发达，宋人袁燮《挈斋集补》中“吉州八县之民，输米郡仓，斛计四十八万”云云，即为一证。又抚州府，“介江湖之表，襟闽越之疆，其在南昌，则肘腋要地也。东南有事，郡亦必争之所矣”^{[2](卷六十八)}，作为省府南昌的东南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优势极其明显。而抚州的经济，自古以来便以繁华著称于世，若临川在唐代便有“名区”之谓，张保和《抚州罗城记》谓：“翳野农桑，

府津寰阁，北接江湖之脉，贾华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3](卷八百十九)}至于南昌府的地理经济状况，更是以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斗之墟”昭著宇内。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无疑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相较而言，赣州、南安等府县，则地处南岭北麓的山区腹地，境内以高山、丘陵、谷地为主，至明代初期该区域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地理交通的影响，总体而言，还处于尚未完全开化或者说开发滞后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文化发展要来得更为缓慢。因此，这些地方的诗人数量相对较少甚至为零，也便在情理之中。

(二) 历史人文背景。地理经济状况与文学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文化又在其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江西文化直至唐宋时期才真正显露出勃发的生机，吉安、南昌、临江、抚州、建昌等地，实际也成为这一时期江西文化中的翘楚，这既与这一区域的地理经济状况相关，也得益于大批北方移民，尤其是文化世族的迁入。

自魏晋南北朝至唐末的几次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江西成为重要的接纳地，而南昌、吉安、抚州、临江、鄱阳等相对安定和富庶之地，又是其核心区域，更为重要的是，迁入者又不乏文化渊深的世家大族。据光绪《泰和县志》卷二《輿地考》，唐末战乱，“四方大姓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繁，逐倍蓰于旧”，《县志》所及姓氏，实即历史上所谓的具备了较高文化素养的南唐故家。至于庐陵的欧阳氏、吉水的解氏、吉安的文氏等大族，都是唐时由北方迁入。同样，抚州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庶安定的政治环境，也吸引了晏氏、曾氏、王氏、李氏、乐氏等外邑大族的入迁^{[4](pp. 8-9)}。关于移民与迁入地的文化关系，有学者指出：“有些移民只是普通百姓，但因迁出地有读书的风气，也会对迁入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因移民的迁入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5](p. 108)}显然，这些北方移民尤其是世族的迁入，既促进了吉安、抚州等地的人口繁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兴盛，一大批在文学、历史、学术等方面取得成就的文化名流，如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姜夔、洪迈、刘敞、刘攽、乐史、李觏、陆九渊、文天祥等，均诞生于这一区域，他们往往又被当地后人树为永久性的乡贤典范，为该区域后世文化发展确立了坚实的精神坐标和厚重的人文积淀，并在时间的淘洗中凝聚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不断促进当地文化事业的繁荣。明初，环鄱阳湖区域为什么会诞生这么多的诗人，若论其原因，也理应从这一角度展开探寻。

(三) 教育背景。在中国古代社会，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当地教育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明初江右诗人集中

的地方,多半也是教育发达之地区。我们可以书院、科举为例加以印证。江西教育起步虽不算早,但自宋以来,无论官学、私学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至宋元时,随着理学的兴起,江西的书院建设已成为全国之首,而吉安、抚州、南昌、临江、建昌、饶州等地,则又位于全省的前列^[6](pp. 273-356)。至于科举,则与书院教育状况成正比。自宋以后,江西科举极其发达,长期居于全国三甲,明代则达到了鼎盛。据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7]考察,吉安、抚州、南昌、临江、建昌、饶州、广信等府科举所取进士数量,虽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自唐至明清,又一直居于前茅;相较而言,赣州、南安、袁州、九江、瑞州等府,科举成绩,则完全处于劣势。尚需注意的是,古代科举考试多与诗赋相关,而地方科举的繁荣与当地的教育发达又是密不可分,由教育到科举,再到文学文化的繁荣,实际形成了一条人文(包括诗歌)兴盛的直接或间接路径。而绝大部分的古代文人,实际都与科举带有一定的因缘,《诗征》所录明初江右诗人即是如此,所以,如果把握住这样一条路径,便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答明初江右诗人地域分布不平衡这一疑问指明了切实的方向。

当然,除了以上所及,诸如朝廷的政治策略的异动、时代格局的升沉、社会动静的变迁等因素,往往也与地域文化生态相关联。因此,在考察明初江右诗人分布的历史文化背景时,我们也可将它们纳入审视的范围,但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展开讨论。

三、明初江右诗歌创作的“雅正”风尚

明初江右诗人众多,由于生活环境、思想禀赋、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乏个性面貌,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然而,诗人们大致相同的生活时空范围,又使他们的创作难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域趋同性。

江西诗歌,自汉魏以降,流传较少,至赵宋蒙元则作者代兴,眩人耳目、毕世风流者不乏其人。不过,作为儒风甚浓的区域,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江右诗坛却似乎深深地笼罩在儒家“诗无邪”传统的影响之中,在思想上强调美刺教化、感发意志,在艺术上追求和婉中和、雍容典雅,成为其心力所向。豫章黄庭坚,论诗以“温柔敦厚”为则,堪称以“筋骨理思胜”的宋诗的代表;吉水杨万里,亦以清新自然的“诚斋体”,流芳于后世;而“元诗四家”中的江西人虞集、范梈、揭傒斯,又以正大平易、典雅渊深为胜场,总领诗坛风会于一时。从他们诗歌创作中,透露出一种浓厚的雅正气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地域诗风的相沿相袭。

有学者指出:“元代末年,随着生活的世俗化和文化的多元性,极大拓展了士人的视野和胸襟,大多数士人

主动逃离功名仕途,转而追逐风雅放情的生活,个性纵横。诗歌创作打破了元中期以来‘盛世之音’的雅正,直抒性情,风格多样。”^[8]这种说法大致符合元季诗坛的实际,以杨维桢为中心的“铁崖体”诗人群和以顾瑛为代表的“玉山草堂雅集”,则堪称典型。然而,沿着由前代乡贤铺设的诗学路径,即便到了与明朝交会的元代末期,一大批江右诗人,也并未能完全融入肯定人性、以自然为尚的性情诗潮之中,他们依然鼓吹类乎“盛世元音”的风雅正声,危素便是其中代表。危素生于元中期,成长于儒学风气浓厚的文化名邦临川,与江右贤达如吴澄、虞集、范梈、揭傒斯均有过交集,甚至还有师生之谊。因此,虽大部分时间活动于元季,他却能“承唐宋之遗脉,接虞柳等之绪论,以儒家礼义为规范,推崇‘鸣治平之盛’的醇和雅正文风”,他的诗歌创作亦每见“唤起鼓蒙陈睥睨,洗空盆盎出清醇”的特质^[9]。

真正进入到明代,与历代帝王一样,最高统治阶层为了巩固政权,开始在文治上大做文章。为了一洗“胡风”旧习,重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朱元璋定鼎后便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大力倡导文学须“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为明初文学为政治的“主流文学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0](pp. 28-34)。实际上,这同样为江右诗人的雅正音声的延续、播扬提供了最佳的契机和平台。为了适应所谓的文治需要,一大批江右诗人开始进入到上层文人集团,并借此发挥对文学的作用。如危素,深得“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钦仰。宋氏能因势利导,以“太音玄酒”称其诗文,一方面借此表达自己依从于君的文学趣尚;另一方面,又将危素作为前代样板,为朱元璋的文学观代言,客观上也为危素文学思想的后世接受架起了桥梁^[9]。又新淦名诗人邓雅(字伯言),早岁以诗名乡里,元末隐居不出。入明,他能以布衣之身为宋濂所赏爱,并荐之于朝,授翰林之职,与其“气味冲澹,颇有自然之致,究为不失雅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诗风密切相关。《豫章诗话》载其事:

新淦邓伯言尝游于玉笥山,题诗于壁曰:“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宋潜溪大赏之。太祖召见,命作钟山晚寒诗,有曰:“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上以手拍案,大嘉之。伯言伏丹墀,误疑怒己,虽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授翰林院官。^[11](p. 101)

再如,鄱阳文士刘仔肩(字汝弼),居元也是布衣不入仕途,明初则以诗名征召入京师。《诗征》称其“明初以文行荐召至京,集都人之诗为《雅颂正音》,附以己作,草昧之初,风雅赖以不坠”^[1](卷四十三)。确实,取雅正而为《雅颂正音》,借此不惟可观明初诗风之消长,又可一窥刘氏重续儒家诗学传统的衷心。正因如此,《雅颂正音》同样得到了持守风雅正声的宋濂的青睐,

并不吝笔墨为其序,俨然称其为明代“为雅颂,被之弦歌,荐之郊庙者”之“权舆者”^{[12](卷首)},以助其传扬。至于名震明初诗坛的泰和刘崧(字子高),学诗更是以乡贤虞集和揭傒斯为楷模。于此,他在《槎翁诗集自序》中有明确标示,谓:“年十六,得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诵之,昼夜不废。”^{[13](卷十)}既然如此,刘崧诗歌呈现出典雅的风貌,也是自然之事。其他由元入明的江右诗人,如陈谟、梁寅、周是修、王佑、王沂、萧翀、揭傒、吴伯宗等,在文学上都受到类似的礼遇,若论其根本原因,与他们创作上的雅正气,当不无关系。

随着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明初文学生态也在发生悄然变化,而应“仁宣之治”之运而生的“台阁体”文学,无疑是这一生态中最为耀眼的部分。与政治时代相适应,“台阁体”诗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在内容上表现为歌颂太平,在艺术上则显示出雍容和雅之气象。在这样一个文学群体中,江右文士俨然成为其中坚,泰和杨士奇乃其主帅,胡广、金幼孜、王英、王直、周叙、曾鹤龄、刘定之等江右文士,则是其主将,细绎他们的诗歌创作自不难发现“雅正”之貌。如杨士奇(字东里)诗,贬之者谓“东里如流水平桥,粗成小致”^{[14](p.1033)},褒扬者则称“清真丽则,悠然而有余思”^{[15](p.541)},但他们评鹭的落脚点,似又都不离“雅正”二字。当然,与杨士奇同时尚有一批被排除于“台阁体”之外的江右馆阁文士,如解缙、曾棨、李昌祺等,但作为江右人和近侍之臣,他们的诗心又不能不被地域传统和时代风潮所感染。如吉水解缙(字大绅),后人论其诗每以太白、子美相媲美,杨士奇为其所撰《朝列大夫交趾布政使参议春雨解先生墓碣铭》,即赞其诗“豪宕丰赡似李、杜”^{[16](附录)}。这种将大绅与“李、杜”两相比较的做法,实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诗具有风格豪放、思致深厚的两面性,论其根本,也并没有背离儒家传统的雅正诗学观。而在大绅的《文毅集》中,如《退朝即事》“圣主恭勤日万几,每因朝退问前疑。挥毫亲写蝇头字,常见官官报酉时”^{[15](卷六)}一类的作品,也不算少数,只是将雍容融于疏逸中罢了。

明景泰年间,会稽人韩阳辑录洪武至正统近百年间89位江右诗人诗作为《皇明西江诗选》,并序曰:“西江实海内名邦,文献为东南之最,由晋历唐,由唐及宋,才人迭出,胜国时大著诗名者四,而三人出江右,国朝以诗著名者非一人,而江右居多。尔年奉敕巡抚兹土,

都选姑苏韩公政务之余,博询洪武迄今已故诸公诗稿,时遍阅之,见其飒飒乎皆治世之音,足以鸣国家之盛。”^{[17](p.401)}综上可言,江右诗坛自宋元以来,已然形成了一种浸淫了儒家传统的地域诗歌风情,“雅正”即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时至朱明王朝,也并没有因为诗人地理分布的不平衡而遭搁置,以致断裂;相反,这一风尚却在朝廷文治策略的导引下得以强化,甚至对明初乃至整个明代的诗歌生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阳“飒飒乎皆治世之音”之谓,实非姑妄之言,它与明初江右诗歌的实际是相符契的。

【参 考 文 献】

- [1]曾燠.江西诗征[M].清嘉庆九年(1804)南城曾氏赏雨茅屋刊本.
- [2]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董诰.全唐文:第9部[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罗伽禄,徐国华.临川文化大观[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 [5]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6]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 [7]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4).
- [8]罗小东.论元代末年士风与诗风[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 [9]温世亮.危素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平议[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10]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11]郭子章.豫章诗话[C]//豫章丛书:集部9.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 [12]刘仔肩.雅颂正音[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3]刘崧.槎翁文集[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4]王世贞.艺苑卮言[C]//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解缙.文毅集[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6]裘君弘.西江诗话[C]//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7]韩阳.皇明西江诗选[C]//豫章丛书:集部8.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温世亮:南昌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金建锋: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责任编辑 洪 军]